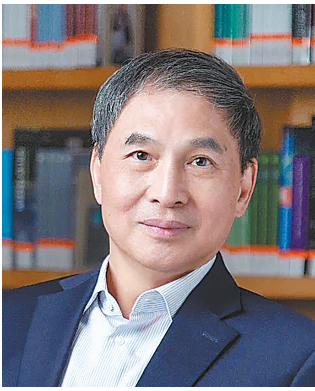


把握未来五年的确定性和开拓性 机遇由外部环境赋予变成由自己去创造



武汉长江大桥。(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仵磊 摄)

访谈嘉宾



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
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十五五”规划建议
提到16个“强国”
4个“中国”目标

制造强国 质量强国
航天强国 交通强国

网络强国 教育强国
科技强国 人才强国

金融强国 贸易强国
农业强国 海洋强国

文化强国 体育强国
旅游强国 能源强国

数字中国 健康中国
美丽中国 平安中国

制图 徐云

国际局势在发生变化,出现新的特征
中国有定力、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您怎么看未来五年的世界发展大势?



郑永年:改革开放初期以来,和平与发展就一直是世界的主流趋势,也一直是中国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当前,国际局势正发生变化,甚至出现“有限全球化”、逆全球化甚至去全球化的一些特点。世界发展的趋势是会恶化还是会向好?全球主要经济大国在其中发挥关键的主导作用。

近年来,一些国家卷入了外部战争。尽管这些冲突是区域性的,没有连成一片,但无论如何,仍深刻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无论是在西方世界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内部还出现了一些不稳定迹象,内部矛盾增加。西方主要表现为全球右翼势力的整体抬升,一些发展中国家则经历着各种社会运动。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这些国家所面临的外部冲突或内部矛盾,背后的根源是什么?



郑永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作为全球化的引领者和技术创新中心,西方经历了普遍的繁荣。但随之而来的是,这些财富落入了极少数人的口袋,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社会分化越来越明显,失去了一个健康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公平。

一方面,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内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带来社会不公平,会导致冲突和混乱。

另一方面,全球性的经济不平衡,还会导致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公平。一些国家在 globalization 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另一些国家不仅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继而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您分析的这种世界大势,在未来五年是否会发生好转或出现其他改变?中国如何在全球动荡变化中保持定力?



郑永年:我个人认为不太会有巨大的改变,其中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但如果和“十四五”时期中国所处的世界环境相比较,未来五年,不确定性里又有确定性。

“十四五”时期,中国面临的“黑天鹅”事件实在太多。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时,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拜登政府期间,美国对华贸易战变本加厉。还有新冠疫情、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印巴冲突等等,都是没有预料到的。

未来五年,俄乌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暂时安静下来的区域冲突是否再次爆发,一些国家的内部矛盾能不能缓和,我们都无法知道。相比“十四五”时期,可以确定的是,已经存在的这些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随时有可能出现新的变化,但是,无论从心理上还是政策上,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有定力、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经过几轮交往,中美双方趋向理性务实
在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确定性无疑是存在的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作为两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美两国在地区和世界舞台上的良性互动,是应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的关键。您怎么看“十五五”时期中美关系的走向?



郑永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走向会影响整个世界格局和世界秩序的重构。虽然中美之间未来会发生什么,难以预测,但这其中的确定性无疑是存在的。

未来五年,有将近四年是特朗普的任期,且往后看,特朗普对美国内部政治的影响力可能还会延续。

在特朗普第二任期,迄今,中美两国已经经历了几次较量,彼此其实更加熟悉。美国政府认识到了中国的强大,也对中国

更加了解;中国对特朗普政府也更加了解,在多次坚定的回击中越来越自信。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华政策采取的是从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经贸科技领域三条战线同时进行围堵。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三条战线”很大程度上被浓缩为经贸科技这条战线。

在经贸科技领域的博弈中,中美双方的互动留下了很多启示:站在特朗普政府的角度,这是可以“交易”的领域;站在中国的角度,这是可以“谈判”的领域。今年的贸易战,中国打得就很漂亮。美国滥施“长臂管辖”,中国有办法来有力反制。

我对未来五年中美关系的走向保持审慎乐观。从经济利益等各个方面的角度看,现在全球化的世界也是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世界。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是越来越多的。如果还是按照过去那样,美国政府执意采取各种方式遏制和打压中国,那么中美关系就会越来越糟糕,整个世界也会遭殃。在经贸科技领域,中美两国实际上是非常互补的。美国的基础科研实力、服务业尤其是金融服务和生产性服务业、软件生产等具有比较优势;中国和技术应用、基础设施上具有鲜明优势。两国在制造业、农产品领域也很互补。

实际上,中美两国之间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只是如美国所言具有很多经贸冲突特征,更为重要的是缺少政治信任。经过这几轮交往,中美双方趋向理性务实,这有利于中美关系的稳定。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稳定住了,世界其他方面的区域冲突、小冲突都是可以管得住的,不会对整体的国际格局造成太大影响。



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
中国作为大国的国际观,也是重塑世界秩序的方法论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中国在推动中美关系稳定中,如何发挥更多的建设性作用?



郑永年:未来,中国与美国免不了要继续斗争。如今中国和特朗普政府的关系,也是靠中国斗争来的。尤其是今年年初以来美方挥舞所谓“对等关税”的大棒,把世界搞得乱七八糟。中国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对等关税”的国家,中国做对了。

大家手中都有牌,但中国还是秉持“止戈为武”的哲学。中国找出这些牌,不是为了使用它们,而是要防止美国滥用牌,促使美国理性一点。

中美之间,会有斗争也会有妥协,这就是未来的基本盘。并不是说一点斗争没有了,确定性就在于,中美还是会斗争,但在斗争中,双方都能找到可以接受的妥协点。

我们必须承认,美国、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都很难独自承担重塑世界秩序的责任。美国也好,中国也好,缺少对方的秩序,都不叫国际秩序。美国不能构建一个没有中国的世界秩序;中国没有可能去构建一个没有美国的世界秩序。

近期中美两国元首在韩国的会晤,就卓有成效。我们要看到这次谈判的深刻意义。以前我们说中美之间是“斗而不破”,但是这次谈判我们不仅实现了“斗而不破”,还实现了“在斗争中往前推进”,并且是往积极的方向推进。这不仅是对中美两国关系的推进,也是对整个世界秩序重塑的推进。

未来五年,中美关系将会在斗争中实现进步,即通过阶梯式递进来重塑这对大国关系。在总体方向上,中国追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和目标从来没有变过,这是确定的。中国的政策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并且中国已经准备好按照这三原则,同美方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双边关系,这是我们始终追求的目标和方向,也是确定的。

当美国意识到中国的战略定力和坚定立场,愿意与中国相向而行,愿意同中国妥善解决分歧,中美双方的竞争就会是正向的竞争,就会在管控中朝着向前、向好的方向去,而不会重蹈美苏冷战的覆辙。

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强调的是要抓住机遇,这意味着这个机遇是外部环境赋予我们的。现在,中国其实已经强大到可以自己创造机遇了。在中美关系上,中国其实也到了可以自己创造机遇的时候。从目前来看,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是做得很好的,掌握着主动权。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双方应该算大账,多看合作带来的长远利益,而不宜陷入相互报复的恶性循环。”中国有能力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承担着大国责任。尽管世界大势已经不同于过去,但中国还是要努力追求和平与发展。

这些年,中国确实也是这么做的,我们提出了“四大倡

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这就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国际观,也是中国重塑世界秩序的方法论。这些都表明,中国会坚定不移承担好大国责任,不仅要为建设美好中国而努力,也要为构建美好世界而努力。



以“大科研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
这是把中国经济带向下一个阶段的关键路径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未来五年,我们应该怎么看中国国内的发展趋势?确定性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郑永年:实际上,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区域冲突,既不是中国的战争,也不是中国想控制就能控制。相较之下,国内发展环境反而具有更大的确定性。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若要追求和平与发展,就必须具备足够的实力。

对中国国内而言,这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改革、开放和创新上,“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了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中国发展的大势是很清晰的。

中国式现代化分两步走,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2035年,中国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意味着我们的人均GDP要增长至2.5万甚至3万多美元。往高了算,就是“亚洲四小龙”中韩国的水平——大约3万多美元;往低了算,目前中国的人均GDP约1.34万美元,离2.5万美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从潜力来看,实现这个目标没有问题。无论是国际形势,还是中国式现代化锚定的目标,都要求我们必须发展。

有了这个目标,应当怎么做?“十五五”规划建议就是行动指南。“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是极大的确定性。在改革开放年代,发展是硬道理。到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在“十四五”时期,我国就已经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前两年,我国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到此次“十五五”规划建议,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放在战略任务的首位,强调发展实体经济非常重要,主攻方向其实就已经非常清晰了。

传统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很重要,还会继续产生经济活动,但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面临新的挑战,有新的问题要解决。有人认为需要靠消费来拉动经济,提倡发钱来拉动消费,这样的想法过于简单。

尽管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时期,对我国进行了多年的“脱钩”,但至去年,我国对美国的出口总额达5000亿美元,我国对欧洲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还在继续,尤其是对东南亚的出口已经占了大半。出口已经发挥了作用,而且还要发挥作用,但从现实来看,新动力需要进一步生成。

那投资呢?公路、桥梁、高速公路、高铁,通过长期的积累,这些都已经做得比较成熟。对新基建的投资还会进行,但要进一步拉动经济,也有新的课题要破解,新的局面待打开。

所以,我国在这个关键时候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这是基于技术进步至上的产业升级,也是这次“十五五”规划建议的重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教育、科技、人才放在一起统筹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我把这些部署统称为“大科创体系”。通过发现新的技术,把新的技术转化成为具体的经济活动,就是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这是“十五五”期间我们可以做、也能够做的,是能把中国经济带向下一个阶段的关键路径。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世界趋势中的确定性和中国自身发展的确定性,二者是什么关系?



郑永年: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一个国家如果要把握世界趋势的确定性,前提就是国内的确定性及其实力。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模式,党的十九大报告总结得很好。我概括一下,就是中国既获得了发展,也保持了独立。这点很重要,就是中国的发展是自主的。正因为是自主的,外部变化对国内的影响就是可以积极应对的。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具备了足够的实力来抵御和化解外部的压力。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些年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表现出了坚强的韧性。这次中美元首在韩国会晤前,特朗普使用了“G2”这个概念来形容这次会晤,这是具有深意味的。

(湖北日报全媒体记者 常少华 整理)